

Articles

Conferences
& LecturesResearch
Activities

莫理循文库东渡前后的中国反应

马 军¹

有关澳大利亚旅行家、新闻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年）的生平志事、所遗文献，一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研究²，特别是其闻名遐迩的东方学文库“失之于华，而得之于日”，一直是议论的热点。然而当年中国何以丧失购买的机会，以致其最终流落异域，除了归之于北洋时期的国运日衰、财政困难和政局动荡外，尚缺乏更为全面而细密的考查，拙文则试图在既有资料的基础上，连点成线，对此有所推进，尤其是关注当时中国各界对此事的反应。

（一）

1897年2月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开始常驻北京，因工作需求，也因其本人的藏书癖，开始系统地收集以远东事务（尤其是中国问题）为主题的西文图书。经过了十余年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一座覆盖齐全、享有盛誉的文化宝库。据说在世界的同类藏书中，它是“迄今最最完善的一部”³。

莫理循最早萌生出售文库的想法，大约是在1912年初，此时他打算辞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一职返回澳大利亚，但因经济拮据，很是担心回国后的生活质量。3月27日，莫氏在《泰晤士报》的后任记者戴维·福来萨（David Fraser）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

王宠惠有一个创建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整套计划。有好几次我故意称赞你的图书馆来触他的痛处，今天我建议他应该去找你，要你把藏书送给中国政府。但是我接着说，我不相信你肯放弃你的藏书等等，不过你可能在遗嘱中把你的图书馆赠给这个政府。可是他认为如果任命你为图书管理专家负责掌管现代化图书馆，可能会劝使你把它卖给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我为你做了有益的工作，如果买卖成交理应拿一笔佣金……⁴

从上述文字中大致可以推理出如下两点：其一，莫理循应该在更早些时候就产生了出售文库的意图，且已在戴维·福来萨面前有所流露，故而后者对王宠惠有此试探；其二，企图创建国家图书馆的王宠惠对购买莫理循文库不无兴趣，并有以图书馆要职相诱的念头。

王宠惠（1881—1958年），原籍广东东莞，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1902年他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通晓日、英、法、德等多种外语。1907年曾将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译成英文，获得了世界法学界的广泛赞誉。这一时期，先后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他既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又是一个长期浸润于西文世界的著名学者，对莫理循文库的学术价值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王宠惠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对购买文库有想法的实力人物，但三个多月后他就辞去了司法总长一职，到上海任教去了，故而购买一事便没有了下文。

同年5月17日，21日莫理循在给乔·厄·白克尔和J. R. 赫顿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卖书企图，并开价4万英镑。在后一封信中，他则特别提到了可能的买主和附带条件：

我希望从三类不同的收藏者那里得到购买我的藏书的出价——从有钱的美国人、从中国政府 and 从日本

政府三者。我的愿望是这些藏书应该保留在北京目前的建筑物里；应该保留我的姓名以及应该成为中国国立图书馆的核心部分。这也是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士的愿望。我们的公使已经答应向日本公使谈一谈有关日本政府已在考虑购买的事……⁵

显然，莫理循早已将出售风声传扬出去，而此时可能的三方买主中，中国方面似乎胜算更高，因为在“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士”的影响下，莫氏更倾向于将图书保留在北京原地，并成为中国国立图书馆的一部分。他在这一时期的一则日记中也写道：

如果中国人能买下我的图书馆，我愿意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楼上我自己的住处用来做一个外国图书馆员的住处，直到他把图书目录编完付印为止。楼下的房子可以改为阅览室……。我决定要求图书馆仍然以我的名字命名。⁶

至于日本方面，按照莫氏后来的说法，此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曾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谈及“是否有可能由日本政府，或者由某个日本学术机关为日本收买我的全部藏书。约在同一时候有人问我是否愿意由一位没有向我吐露姓名的日本贵族巨富收购我的藏书。”⁷当然最后花落谁家，仍需时日洽谈与斟酌。

7月27日，戴维·福来萨在上海著名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发文，介绍了莫理循文库的概况⁸，这明显是在为朋友的出售活动做相应的舆论宣传，以招揽潜在的买家。

是年8月，莫理循被高薪（年度总收入为3950英镑）聘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继续待在北京，为期5年。这虽然使得他的售书计划变得不再迫切，但也并未让他就此改变原意。之后，他一边利用这份高收入继续扩展收藏，并雇人编制了一份1600张的目录⁹，另一方面仍继续寻找最终的买主。

1913年秋冬，美国方面又有人向莫理循伸出了手，莫氏事后写道：“我的决心为最近来北京的某个美国代表团所知。我可以说不为此事进行认真的谈判，更说不上达成什么协议。迄今现在发生过的事情，只是他们讯问我是否愿意把藏书卖给美国的一个学会，而我则作了肯定的答复。”“美国代表团曾经问起我对这份收藏的估计价值有多大。我说40000英镑。”¹⁰此外，与莫氏有过接洽的还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

事实上，此时莫理循已开始将出售的天平倾向日本方面。1913年12月27日，他秘密致函多年的好友、前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请其为他在日本探寻是否有被收买的希望。他表示“虽然我准备卖掉我的藏书，我却是宁愿它永久保藏在远东。”“如果这样一套藏书归于日本所有，我知道它定会受到妥善保管。”¹¹不久之后，莫理循向日方承诺，“可以首先给他们以取舍权”¹²。

此举最终导致了1917年8月29日与日方的签字成交，在日本财界和学界人士的联合说项下，大实业家岩崎久弥男爵出资3.5万英镑（约合28万白银，35万日元）购下了全部藏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此不再赘述了。

顺便一提的是，虽然莫理循居华多年，但他不懂中文，因而充其量只是汉学研究的一个边缘人物，更确切地说仅是一个收藏家、版本学家。由此，他的藏书和售书计划尽管在一些报刊上有所宣传，但并非是主流的汉学刊物，故而在整个国际汉学界的知名度可能依然有限，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东方学强国——法国、荷兰、英国、德国、瑞典和俄国的汉学部门对此并未有所反应，当时西方汉学的顶尖人物沙畹（E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高迪爱（Henri Cordier）、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等，以及众多汉学团体和学会，似乎与他也没有什么联系。英国汉学库寿龄（Samuel Couling）对文库的长篇介绍，实际上是在文库售出之后¹³。

（二）

由于莫理循倾向于将藏书保留在远东，故而美国买主想必是最早就被排除了，竞争实际上是在中、日之间。莫氏之所以改变最初构想，下决心售诸东瀛，除了他多次去过日本，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强盛、注重文教、办事认真有切身体认外，还可能与其内心对北京的不安感有关，近十余年间政局迭变，兵火频仍，他的藏书始

终面临着被毁的威胁，并“有过奇迹般的经历”，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有三次。

其一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莫理循的住宅及其文库起初位于北京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马建忠的旧宅内。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区，莫氏亦陷入其中。6月24日早晨，莫理循被告知应当将全部书籍转移，否则必将遭到义和团的攻击。莫氏遂迅速召集几百名中国教民，组织了一个长长的传送队，很快将全部藏书暂时搬进肃亲王善耆的府邸。果然，几个小时后，原先的住址便被彻底捣毁了。在这次劫难中，只失落了一本书，但随后莫理循就设法将它补齐了。然而北京的其他西人图书馆则没那么幸运了，赫德（Robert Hart）、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以及海关和传教士们的藏书，几乎损失殆尽。其间，莫理循甚至还目睹了邻近的翰林院的熊熊大火，该院建于明代初期，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收藏古籍善本之多罕有其匹，价值连城，但结果“数百年来一直安安稳稳地放在书架上的珍贵手稿被扔得遍地都是，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偷盗；数吨珍本被扔进了池塘里。”¹⁴这一定让他触目惊心，愤怒不止！事息后，莫理循将居家和文库北迁到王府井大街的一处中国式住宅，离使馆区大约有半英里。

其二是1912年2月29日，袁世凯在北京策动辖下的第三师发动兵变，大肆抢劫、纵火，遂以安定北方为借口，拒绝到南京就任大总统。是日晚7时30分，莫理循在归家途中，“正看见我住宅附近的房子在起火燃烧，大火正从四面八方烧起来”，“事实上，东、西、北三面熊熊大火离我住宅那样近真够使人焦急的。幸亏我在不久前盖起一间防火的藏书室。星期四晚上我回到我的住宅立刻就和我的仆人一起把我全部值钱的东西都搬进这间藏书室中去。”¹⁵所谓的“藏书室”指的是1911年11月莫理循建造的一座防火屋，他将全部藏书纳入其中。这是一座防护严密的大屋子，白天采光良好，夜晚灯火通明，书籍装订得非常精致，一排排陈列整齐。稍后，莫氏还向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投保，金额是2.5万英镑。

其三是1917年7月上旬，先是张勋“辫子军”进京扶植溥仪复辟，继而段祺瑞又派兵将其驱逐。7月8日，莫理循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今天早上东城外有枪声，我听说有个人力车夫被流弹打中受了伤。我在凌晨四点，十分清楚地听到离得很远的枪声。昨天，有三颗炸弹落入皇宫，只有一颗爆炸。一颗炸弹掉到湖里，另一颗也没有造成损失……”¹⁶10月31日他在给韦罗璧的信中又回忆7月12日：“我揣想，双方互射所发子弹不会少于五千万发。双方都出动大部队。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烈。”¹⁷

由此想见，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必定让莫理循心有余悸，阴影重重，北京这个多事之地，终究不是文库的理想归宿。或许这正是他最终选择东京的根本原因，尽管后者地震频发，但政治和社会状况稳定。

当然，主人的选择意向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买方的主动性亦有可能改变局面。较之于日方，中国方面尽管有购买的舆论，但似乎始终未有实质性的应对。

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曾两次造访文库的刘耀黎在十余年后这样回忆：

民四之秋，摸氏以病欲归国，拟以廉资十二万元让于中国政府或学术团体。时教育总长汤继武力主由京师图书馆购度，请资政府，袁氏不允。公府中人有主购度于流水音，亦未允。余时为教部秘书，建策在北京大学附近筑“京师图书分馆”藏之。会筹安会劝进事炽，相率云散。汤公去职时，以兹事委之来者，亦竟未果，惜哉。¹⁸

这段文字虽然篇幅短小，却提供了不少线索和关键词。“汤继武”即汤化龙（1874—1918年），民国初年立宪派头面人物，早年留日学习法律，他在北洋政府内担任教育总长的时间是1914年5月至1915年10月。1918年9月在美国被暗杀。在汤之后任教育总长的依次为张一麐、张国淦、孙洪伊、范源濂。

“京师图书馆”就是前文所述的“中国国立图书馆”，亦即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它成立于1909年，馆址在北京什刹海的的广化寺。入民国后隶属于教育部，江瀚、夏曾佑先后担任主管，周树人（鲁迅）亦在其中担任要职。1917年馆址迁往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其时，该馆馆舍无定、经费严重短缺¹⁹，只能将主要财力和精力用于《永乐大典》的若干残本和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入藏工作。

至于“袁氏不允”，是指袁世凯本人不允，还是指其属下的政府机关不允，此处语焉不详，但至少表明教育部的上级部门并不支持；“筹安会”则是1915年8月杨度等人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支持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

公开呼吁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意指袁世凯称帝引起的局势动荡对此事亦有影响。

民国初年，由于各地许多税收被截留，再加要镇压各方的反对势力，北洋政府财政亏空，赤字巨大，熟知政情的莫理循对此亦有颇多描绘²⁰，故而有1913年向英、法、德、俄、日五国的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之举。在此情况下，由国家部门（比如预算极为有限的教育部、京师图书馆等文教机关）出资28万两白银购买莫氏藏书，确非易事，但如果由官绅富商、地方势力和民间团体出资（亦或集资）却也并非没有可能，穷庙中的富和尚应当不在少数。²¹今人戴银凤就曾认为，3.5万英镑并非天文数字，中国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实力和可能性，即通过社会集资或个人捐款与政府支付相结合的办法，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莫理循藏书的重要价值”。²²

（三）

莫理循出入中国新闻、政治和外交舞台约20年，他具有“一种善于结交朋友的极大本领”²³，结识了许多中国“精英”人物，并与其中不少人成为好友。由于他几乎不懂汉语，故而这些人里通晓外语、有海外受教和服务背景的比例很高，他们或身居高位，或学识渊博，不乏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仅以骆惠民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一书所收1912至1917年间莫氏的通信对象为例，主要就有如下一些人士：

人名（生卒年）	简 历
魏易（1880 — 1930）	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904年任北京大学英文教师，1911年任大清银行秘书，1914至1917年在全国石油管理局工作。曾和林琴南合作汉译50多部英文小说。
蔡廷干（1861 — 1935）	早年是留美幼童，后参加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被俘。获释后入袁世凯幕府，1912年任高等军事参议、海军中将、大总统府副礼官，1913年派充盐务总办、税务总办。
温宗尧（1876 — 1947）	早年留学剑桥大学，1897年任北洋大学堂教习，1911年11月任南北议和南方参赞，1916年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外交局长。
丁文江（1887 — 1936）	早年曾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1913年2月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不久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1916年又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温秉忠（1861 — ？）	早年系留美幼童，回国后在上海办工厂，又在美国驻新疆领事馆服务，后为北京海关总局负责人、苏州海关监督等。
刘玉麟（1863 — 1942）	早年系留美幼童，后在清廷驻外使馆服务，1910年任驻英大臣。1917年9月任广州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高等顾问。
孔天增（1879 — 1915）	原系马来亚华侨，1912年在上海任英文报纸《共和辩护士报》主编，次年到北京任袁世凯的翻译，1914年又任总统图书馆馆长。
章彊骏（1877 — ？）	1894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英文，后赴日本学习军事。1912年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全国军界统一会副会长，1913年任驻英禁烟代表。
谢纘泰（1871 — 1933）	原系澳大利亚华侨，后迁居香港加入兴中会，追随孙中山革命。1903年任香港《南华早报》买办，并在许多外国商行工作过。
曹嘉祥（1864 — 1926）	早年系留美幼童，回国后在北洋海军服务。1913年任总统府高等侍从武官，1915年任海军部次长。

梁诚（1864 — 1917）	早年留美，后在清廷外交部门服务，1902至1907年任驻美公使，1910至1912年任驻德公使，入民国后定居香港。
伍朝枢（1887 — 1934）	早年留学美国，又在英国取得大律师资格。1913年为众议院议员，又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外交部条约审查委员，1915年任参事堂参议兼外交部参事。后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司法院长等职。
熊希龄（1870 — 1937）	早年曾参加维新运动。民国之初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至1914年任国务总理。1928年后出任国民政府服务委员等职。
孙宝琦（1867 — 1931）	早年曾在清廷驻外使馆服务，1911年任山东巡抚。1913年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后又兼国务总理。1916年任财务总长并兼汉冶萍公司董事长。
饶孟任（1882 — 1941）	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12年任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任北京政府币制局副总裁、国会议员、法政大学校长等要职。
严鹤龄（1879 — 1937）	190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13至1916年任外交部秘书，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巴黎和会。
陈貽范（1871 — 1919）	民国初年曾任西藏宣抚使、江苏交涉使等职，参加过中英西姆拉会议。
顾维钧（1888 — 1985）	190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历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内阁秘书、外交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后长期在外交界服务。
陈锦涛（1871 — 1939）	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长，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
袁世凯（1859 — 1916）	民初先后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1915年底曾短期复辟帝制。
丁士源（1879 — 1945）	早年留学英国，民国初年曾任段祺瑞的副官长、京绥及京汉铁路局局长等职。
曾宗鉴（1882 — 1958）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13年任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以掌握七种外语而著称。
周自齐（1869 — 1923）	早年留学美国，1911年任清华学堂监督。民国初年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等职，1922年任国务总理。
孔祥熙（1880 — 1967）	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民国初年创办祥记公司专门经销英美火油，同时创办裕华银行。
梁士诒（1869 — 1933）	光绪进士。民国初年历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国务总理等职。
钱文选（1874 — 1957）	1912年以特命名誉会员的身份出席伦敦召开的全英大学会议，1913年出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
郭泰祺（1889 — 1952）	早年留美获博士学位。1912年后任湖北军政府秘书、外交股股长、武昌商科大学校长等职。
刁作谦（1880 — 1974）	1912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大总统秘书，后任驻英使馆参赞，1917年任国务秘书帮办。
段祺瑞（1865 — 1936）	北洋皖系军人首领，191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等职。1924年任临时政府执政。
梁敦彦（1857 — 1924）	早年系留美幼童，回国后曾在海关和外务部任职。民国成立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活动。
梁启超（1873 — 1929）	晚清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1913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917年任财政总长。

除了这份显赫的名单外，同样查诸骆惠敏编的这本书，经常出入于莫理循社交圈的中国名人还有：唐绍仪、严修、张謇、颜惠庆、王宠惠、汪精卫、王景春、伍廷芳、施肇基、曾广铨、曹汝霖、徐恩元、陈銮、陈友仁、胡惟德、陆征祥、严复、伍连德、张君勱、李家驹，等等。

在上述提到的人员中，有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有国务总理，有内阁官员，也有外交家、实业家和教育家，甚至还有大学者梁启超、严复，其中与莫理循接触频繁的不在少数，他们或听说或亲临过他的文库，这些人颇高的外语水平和文化素养要比一般知识界更易于理解它的学术价值。这群“有影响的中国人士”其实也远比一个岩崎久弥更有胜算，更隐含着购买藏书并将其留在北京的可能性，然而虽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结果却因缺乏担当者而完败下来。

诸人之中，笔者目前仅发现两人有购买，或者可能有购买的意向。

其一是袁世凯。与前述刘耀黎所说的“袁氏不允”有异，笔者发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见之1917年8月11日天津《大公报》第2版《莫礼逊藏书楼卖与日人》一文，内称：“去年袁前总统未死前，本欲与莫礼逊君承买，后因袁氏逝世，此议遂作罢论。”（袁死于1916年6月6日）实际上，自1912年末莫理循受聘担任总统顾问以后，袁世凯对他赏识有加，双方接触频繁，关系颇好。袁也一定听说了莫氏有出售文库的意愿，作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力也是拥有雄厚财力的大人物，允诺“承买”是完全可能的。袁本人就有一个总统图书馆，或许正好可以借此充实。

其二是实业家张謇，他曾和友人商洽，有意为新建的南通图书馆购买下莫氏文库。张謇在1913年年底的一天日记中这样写道：

诣钱念劬，谈莫氏书归南通图书馆事。²⁴

1915年5月1日他在致沙元炳的信中又称：

莫氏书目，前以寄蛰老。得复，有“价不大昂，拟罗致之”之语。不知尊处曾否照前议与周君子迪商定？若付现五千，存款一万，作年息七厘，则犹可说也。如何办法，幸以见复。莫氏之目，则尚存汤处也。²⁵

信中的钱念劬、蛰老分别指的是晚清民初的贤达之士钱恂和汤寿潜。

但此事终未有下文，原因不明。或许莫氏并不乐意将文库迁往南通？亦或是钱款问题？

这里还要提到地质学家丁文江，作为莫氏的好友和曾莅临文库的读者，他一直很关注它的去向，并且非常希望它能够留在中国。但1917年8月8日莫理循的信一定让他很失望，因为前者表示藏书已经售给了日方，“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这办不到。”²⁶

顺便一提的是，莫氏与日方签约后即将离华，梁启超曾请其吃饭，梁是最早对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有所认可的中国学者之一，不知斯时斯地他做何感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启超当时正担任着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1917年7月至11月）。

更为讽刺的是，当莫氏藏书从北京王府井宅地装箱运出时，应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的请求，北京警察厅还派出大批警员沿途保护，直至前门外京奉铁路车站运上火车。抵塘沽后，又运上日本邮船会社的汽船高砂丸驶向横滨……

（四）

经笔者搜检，在1917年8月成交之前，中文媒体上关于莫理循文库的报道，几乎未曾见到。而在这之后，则出现过若干篇，其详情可见下表：

标题	责任者	发表媒体
莫礼逊藏书楼卖与日人		天津《大公报》1917年8月11日，第2张
马礼逊出售藏书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8月14日，第2张第7版
接收莫里逊文库之纪念摄影		《盛京时报》1917年9月4日，第2版
莫里逊文库易主保存		《盛京时报》1917年9月5日，第7版
记莫利逊氏之藏书(译自《远东时报》)	愈之 ²⁸	《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年12月15日
莫利逊文库(《日支时论》第4卷第2号)	石田干之助	《北京大学日刊》第113、114、115、116、117号连载，1918年4月17日、4月18日、4月19日、4月20日、4月22日
摩利逊博士(Dr. G. E. Morrison)之藏书楼	可 ²⁹	《科学》第4卷第3期，1918年11月；《申报》1918年11月6日，第14版

莫氏文库东渡之后，一方面日本媒体给出了热烈的报道，另一方面许多在华外文报纸和西方人士则表达了强烈的遗憾，然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却反应平平，似乎只有王景春(1882—1956年，时任京汉铁路局局长)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对于“这个独一无二的藏书，竟然不能保存在它应该被保存的城市里”深感惋惜，他认为应该向“那些有责任照管这类事情的人们提出抗议”³⁰。王氏也是该文库为数不多的中国读者之一。

1924年末，经整理、扩展之后，包含了莫理循全部藏书的东洋文库在东京本乡区驹込上富士前町正式开放，这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多层防火建筑。从1925至1938年间，共计有2919人次的中国人访问过东洋文库³¹，其中不乏知名人士王伯秋、王树枏、祁森焕、杜定友、张元济、汪荣宝、郑贞文、傅增湘、黄炎培、许预甲、陶亢德、孙楷第、董康、王古鲁、郭沫若、蒋廷黻，等等。时过境迁，目睹原在北京的珍稀西籍反在东京得到了妥善安置，并领受着文库主事石田干之助的热情接待，感慨万千者颇不乏人：

石田主事，热心说明，登楼循览，琳琅满架，想见西洋人对于吾国详细研究之际，吾国人方在沉沉长夜梦乡之中，不禁感慨系之。³²(祁森焕)

我国古物保管无方，且时遭兵燹毁损，散失不知凡几，而流传海外者反得珍藏之，所以供世人之考据。我于此徒增无穷之感慨。³³(天鸟)

可惜这稀世之宝，流入日人之手，不能不佩服其眼光之远大，用心之勤苦。我进去参观的时候，叹惜不已，恨不得把它带回，然而这是梦想罢了！语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日本有了这个宝库，对于东亚各国历史民情，洞若观火，我们年来在外交上、政治上受外人的侵略，他们也不是贸然而致的。他们一般政治家，天天在那里把我国当作一件试验品。我国人知道也未？这里要让我们办图书馆的人夸一句口了：“图书关系国脉”。政治家拿了图书，就可以筹划政策，指定方针。日人对于我国情形这样熟悉，所定外交政策能够对症下药，收效神速，这东洋文库亦与有功焉。我很感谢他们的馆长石田先生，送我一部东洋文库的书目，但是见了徒增悲叹耳！³⁴(杜定友)

夫岩崎氏固为日本巨富，但能不耗资于个人独乐之骨董书画，不浪掷金钱于灯红酒绿，而出巨资于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之藏书事业，复能公之于众，是诚难能可贵者也。³⁵(陶亢德)

……

此类心境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莫理循文库到东洋文库”，一百年来成为了中国在文化领域树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话语的特殊素材，它和韶宋楼善本书东售(1907年)以及敦煌文书被劫(1907—1914年)，均被视为清末民初近代中国国势跌至最低谷时，无力保护本国文物、任其外流的重大耻辱而进入了史册。

最后想说的是，民国初年，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尚未进入中国主流学术界的视野，莫氏虽然交游甚广，但他不懂中文，主要是在西文世界里活动，故而与中国学界的沟通也必定有限，这可能是后者与文库失之交臂的又一原因。

注

- 1 中国上海社会科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2 数量之多，难以枚举，甚至笔者为参加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辛亥革命、孙中山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12日至14日）也曾撰写过一篇论文，即〈辛亥时期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遗憾——莫理循图书馆迁日述略〉，后载林启彦等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香港方舟机构有限公司2005年12月版。
- 3 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1917,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p.306.
- 4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926页。
- 5 骆惠敏编，前引书，上，第952、953页。
- 6 【澳】西里尔·珀尔著，檀东鏗、窦坤译《北京的莫理循》，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371页。
- 7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291、292页。
- 8 David Fraser, Dr. Morrison's Library, Unique Collection of Works on the Far East,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7, 1912.
- 9 在此基础上后来出版了 Toyo Bunko, *Catalogue of the Asiatic Library of Dr. G. E. Morrison, now a part of the Oriental Library*, Tokyo, 1924.
- 10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291、292页。
- 11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291、292页。
- 12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682页。
- 13 S. Couling, The G.E.Morrison Library, *Journ. N. C. B. R. As. Soc.*, XLVIII, 1917, pp. 88-90; Samuel Couling, *Encyclopaedia Sinica*, 1917, pp. 305-306.
- 14 西里尔·珀尔著，前引书，第371页。
- 15 骆惠敏编，前引书，上，第910页。
- 16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658页。
- 17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680页。
- 18 刘耀黎〈北京摸利逊书库之回忆〉，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10日。
- 19 按照戴银凤的研究，莫理循文库的售价是京师图书馆1915年实获经费的41.79倍，是1916年预算经费的20.317倍，所以靠该馆的既有经费来收购莫氏藏书是不可能的。（戴银凤〈莫理循藏书与中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20 莫氏在与亲朋的通信中，曾多次谈及北洋政府的经济窘境，例如“中国的财政问题恐怕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严重”，“目前，国库只有六千元现洋……政府事实上是靠发行纸币过日子。”（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474、655页）。袁世凯甚至亲口告诉莫理循，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收入的三倍，“他最大困难是财政上的困难。”（骆惠敏编，前引书，上，第883页）
- 21 按照莫理循根据传闻所做的记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时，她的私人财产估计可达1600万英镑。而大太监李莲英的财产也有250万英镑（西里尔·珀尔著，前引书，第119页；骆惠敏编，前引书，上，第721页）。由此估计，当时拥有巨额财富，在国内外有大量投资的显宦应当不在少数。但他们却忙于搜刮民财，满足私欲，而不是支持文教活动。
- 22 戴银凤〈莫理循藏书与中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23 骆惠敏编，前引书，上，第8页。
- 24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第764页。
- 25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第528页。
- 26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670页。
- 27 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7月初版，第108至111页。

- 28 即胡愈之（1896 — 1986 年），新闻家、出版家、作家。其时任《东方杂志》编辑。
- 29 即竺可桢（1890 — 1974 年），科学家和教育家。其时刚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
- 30 骆惠敏编，前引书，下，第 653 页。
- 31 東洋文庫編『東洋文庫十五年史』，东京：东洋文库，1939 年 11 月，一九二～一九三頁。
- 32 祁森焕〈参观东京“东洋文库”〉，《晨报副刊》1925 年第 70 号，1925 年 3 月 30 日。
- 33 天鸟〈游东感想（四）〉，《申报》1925 年 10 月 23 日，增刊第 1 版。
- 34 杜定友〈日本图书馆参观记〉，《教育杂志》第 19 卷第 1、3 号，1927 年 1 月 20 日、3 月 20 日。
- 35 亢德〈记东洋文库与支那文库〉，《中华月报》第 7 卷第 1 期，1944 年 1 月 1 日。